

研究丛书

洪子诚 主编

与沉默对刺

当代诗歌对话访谈录

唐晓渡 著

北京大学



新诗研究丛书

洪子诚 主编

与沉默对刺

当代诗歌对话访谈录

唐晓渡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沉默对刺:当代诗歌对话访谈录/唐晓渡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

(新诗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0732-1

I. ①与… II. ①唐… III. ①诗歌研究—世界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8258 号

书 名: 与沉默对刺——当代诗歌对话访谈录

著作责任者: 唐晓渡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图片: 西 川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732-1/I · 24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mm × 1300mm 16 开本 19.25 印张 277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观棋不语真君子

—— 民谚

“新诗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推动中国新诗研究的深入开展,出版相关的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工作重点之一。为此,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拟定了组织出版“新诗研究丛书”的计划。丛书的选题主要是:

- 一、新诗理论研究;
- 二、新诗史,包括断代史、流派史、诗刊史等;
- 三、诗歌文本阅读和重要诗人研究;
- 四、新诗文化问题研究;
- 五、有价值的新诗研究资料;
- 六、其他。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新诗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

前 言

古人著述,每分(或被分)为内篇(编)外篇(编)。所谓内、外,或据其与本体的关系,或考其功能性的指向,前者向心而后者发散,大略区别,不必拘泥。以此观之,则本书选入的18篇、时间跨度达25年的对话和访谈,相对于所做过的个案研究和主题论述,或可视为本人从事诗歌批评近三十年成果的“外篇(编)”。书既成,通览一过,屡屡汗颜是免不了的(自然不会因为访谈或对话者的观点),却也有某种未揣谬陋、聊尽心责的坦然。这18篇文字,除1986年冬与杨炼的对话、2009年冬与张清华的对话等少数几篇有过策划环节外,多成于偶然的缘由,换句话说,不但话题未经主动设计,连话语姿态也是被动的。尽管如此,通览这些文字,回味其所涉题旨、史实、作品、人物及相关认知,包括未进入文本的前后故事,还是能连缀起众多记忆的碎片,进而经由更具广角性质的反观,大致看清这些年来在与当代诗歌发展及其历史语境的互动中,一个诗歌服务生之意识、思想、必备知识的发育、生成和变化轨迹。不必说,在诗歌自身的伟大深邃面前,在其生生不息、无限丰富的现实运动面前,这些文字无非是萤光烛烬、管窥孔见,但这只能成为一个人对诗更加虔敬的理由,却不会成为他不敢呈上自己心意的理由。“坦然”云云,斯之谓也。

相较于正襟危坐的论文,对话或访谈的好处是更放松,更活泼,更随意,更多自由转换的空间;但许多情况下应以急智,未经深思熟虑,也更容易露出破绽。对我来说,结集的过程既是一个自我阅读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学习、再度省悟的过程。有些话,当时说了也就过了,回头才发现问题,甚至很大的问题。比如,1986年冬与杨炼的对话发表于美国《知识分子》次年春季号后,有朋友指出那其实不是对话,而是两

个人合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当时哈哈一笑,并未特别放在心上;如今再读,才明白此言实有深意存焉。合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党同伐异,或有助于增强气势,却未必有利于探讨真理;更让我脸红的是那种自以为灵蛇之珠在握的腔调,从中不仅可以品出幼稚和轻狂,亦可品出“文革”的遗风,对本应以彼此质疑、盘诘为导引的对话本身,也不免构成了讽刺。

将近三年前,在为德文版《中国当代八人诗选》(德文书名 *Alles versteht sich auf Verrat*, 德国 Weidle Verlag 出版社, 2009) 所撰的序言中我曾写道:

中国有句成语叫“沧海桑田”,说的是世事变化(或可能的变化)之巨。我相信,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 1919 年“五四”以来,每一代中国诗人在回首平生时都会忍不住发出类似的浩叹。因为无论是否愿意,他们都必须面对同期中国从一个老大的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急剧转型的艰难历史进程,面对伴随着这一曲折历程的无以计数的战争、内乱、灾变和难以逆料的戏剧性,面对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既冲突又融合所造成的撕裂的痛楚和创生的可能,面对这一切给个人命运、个体的内心“世界图像”及其相关的写作所不断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似乎越来越充满偶然性的变数。

而相比之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崭露头角的一代,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可能更强烈,更多反讽意味,更具有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性质。他们的童年和启蒙教育深植于“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他们的精神成长被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加速的国家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过程,被此一过程中丛生的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的巨大裂变和冲突所裹挟;他们的写作既参与了对毛泽东时代那种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垂直支配传统,包括被称为“新华体”的语言传统的终结和廓清,又据以自己的“小传统”(一种经由朦胧诗所接续

和拓展的、基于“个体主体性”的自主、自律的现代诗传统),不断应对“后毛时代”远为阔大、复杂,很多时候是幽昧不明的“问题情境”(包括历史的问题情境和写作自身的问题情境)所提出的挑战。毫不奇怪,他们的作品(不一定是前后期作品)较之前辈也往往更多显示出荣格(Jung)所谓“创伤记忆”和“精神分裂”的征候,因为他们的写作所跨越的不只是两个看似迥然相异,实则彼此缠绕纠结的时代,还是两种在相互搏击中各自创伤累累的文明——既然按布罗斯基(J. Brodsky)的说法,诗人是“文明之子”。

这里说的一代人自然包括我自己,所指则兼及作品和言论。据此反观这本小书,或许可以从字里行间获得更多的东西。情境即心境,心境即语境;不惮其长援引这段话,也是希望其来自沉默、又倾向沉默的语境能与书名和题记互为发明。书名脱自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诗句“与沉默一起对刺”,删去“一起”,“沉默”就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对刺”通“对弈”,棋艺通诗艺;需要指出的只有一点,就是在题记所暗喻的棋局中,那个“观者”并不超然:按照自我相关的法则,无论他是否同意,他都是对弈双方的一部分。而这样一来,所谓“不语”就是一个无从落实的要求——他注定当不了君子而只能是一个学生,就像他说出的,连同他未说出、说不出的一切,最终都注定是沉默的一部分。

识于龙年新年

目 录

“新诗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1)
---------------------	-----

前 言	(1)
-----------	-----

当代先锋诗:薪火和沧桑

——2007 年冬与张清华的对话	(1)
------------------------	-----

“不可能”的游戏

——与杨炼、张学昕一席谈	(42)
--------------------	------

和沉默一起对刺

——谷川俊太郎访谈录	(71)
------------------	------

诗·精神自治·公共性

——与金泰昌先生的对话	(92)
-------------------	------

诗人何为? 诗国何为?

——答沉睡问	(107)
--------------	-------

“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

——北岛访谈录	(142)
---------------	-------

中国式的“后现代”理论及其他

——1994 年秋与陈超、欧阳江河的对话	(150)
----------------------------	-------

面对生存:困境和出路

——1986 年冬与杨炼的对话	(186)
-----------------------	-------

“沙化”和先锋诗的危机

——答万松浦书院网站记者问	(218)
---------------------	-------

诗永远属于“无限的少数人”

——答《南方周末》记者问 (225)

内在于现代诗的公共性

——在第81回“京都论坛”的发言(提纲)..... (241)

诗的洞察力来自思想的洞察力

——答《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 (247)

伟大的诗歌需要伟大的读者

——答《中国艺术报》记者问 (256)

诗歌和公共生活

——与《文学报》记者一席谈 (263)

综合也是一种穿透

——答《中国教育报》记者问 (268)

未来诗歌:重建生活的有机性

——与《绿叶》杂志记者一席谈 (276)

回到诗歌本义的“大”

——在《河南诗人》创刊一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83)

代后记:当代诗歌生态:“场”和“场子”

——在“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生态恳谈会”上的发言 (289)

当代先锋诗：薪火和沧桑*

——2007年冬与张清华的对话

一 命名和源头

唐晓渡(以下简称唐):按委托者最初的考虑,这个选本是要对近20年的当代诗歌做一个总结,既要体现其历时的发展,又要冠以“经典”之名。前一条已经不太好办,后一条就更让人为难了。谁都喜欢经典,谁都喜欢被列入经典,问题是一大堆人,数百首诗,统统经典,这“经典”还有意义吗?人民币在不断升值,经典却在不断贬值,不太对头嘛。真要做个经典选本的话,入选的诗人也许不会超出20个。

张清华(以下简称张):不论是从经典化的规律看,还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我们目前这样做也许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大概也基本符合策划者的初衷和预期。

唐:所以后来改了名字,编选范围也限定为“先锋诗”。老实说是不想额外增加难度。

张:《当代先锋诗二十年:谱系与典藏》,这个书名比较好。“典藏”,比“经典”的说法来得有弹性。“谱系”,则有历史梳理的意思。

唐:考虑到已经有过一些更早的选本,所以重点放在90年代以来;而为了显示其空间而不只是时间上的纵深,又选了一部分相关的诗论和评论。这大概是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的形式,也比较完整。但也存在

* 2007年冬,唐晓渡、张清华应广东《佛山文艺》之约编选《当代先锋诗二十年:谱系和典藏》,2010年5月该刊以诗专号的形式推出。本文系两位对话者根据录音整理修改定稿。张清华,诗歌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问题。“先锋”本来指的是写作意识和方式具有实验性质,和年龄没什么关系;即使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有关系,也不应该是一个尺度。老诗人中也有先锋写作,比如彭燕郊先生的“衰年变法”;也包括一些既不够老,又足够老的诗人,例如昌耀。他晚年的创作实验性很强,尤其是对文体界限的打破——不只是一般意义上打破散文与诗的界限,而是意识和语言方式交相融合的新突破。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但都没有入选。

张:这样做是照顾到了“先锋诗歌”的历史概念,它大体的边界。我觉得类似昌耀那样的诗歌,可以说具有恒久的先锋精神,但是,习惯上没有将他列入“先锋诗”,我们也就不得不尊重这个既成的说法。

唐:先锋诗对当代诗歌来说是个新说法,其实也是个历史概念。胡适的诗现在基本没法读了,但作为新诗的草创者,他在当时却是非常“先锋”的。在传统诗歌的背景下,他那种写法前无古人,完全是实验性的。这样来看,其后郭沫若的《女神》、冯至的十四行、30年代的“现代派”、李金发的“象征主义”,如此等等,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先锋性。但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让“先锋”这一概念在泛化中被稀释掉。“先锋诗”之所以在80年代成为一种耀眼的诗歌现象,有其特定的、不可化约的历史内涵。“先锋”相对于主流和保守,往往和某种激进的社会和艺术思潮相关联,并伴随着大规模的形式实验,其灵魂是开放的自主性和批判的实验精神。先锋意味着对既定秩序和相关成见的不断突破,同时通过自我批判呈现自身的成熟。

张:先锋就是这样,与传统有一种既对立又融合的关系。不断对传统予以“胀破”,同时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唐:对于这种与传统的辩证关系,我更多还是从精神上理解。80年代中期《诗刊》曾举办过一次青年诗论家研讨会,那天会开到一半,唐湜先生进来了,听说正在讨论朦胧诗,就说:你们讨论朦胧诗,怎么不邀请我们这些“老朦胧派”啊?要说朦胧,我们可是朦胧在先呢。也确实有论家将所谓朦胧诗和包括“九叶”在内的新诗现代主义传统挂钩

的。从精神上这样说自无可不可，但并不意味着朦胧诗人的写作直接受过后者多大影响。据我所知，直到1983年前后，一些年轻诗人才开始注意到穆旦；而此前他们的写作，若从布鲁姆所谓类家族亲缘的角度看，与中国新诗谱系的关系较为疏淡，与国外现代诗人反倒更为亲近。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例如，黄翔当初的写作与艾青就有比较明显的承继关系。

张：，从1978年北岛给哑默的信中看，好像“贵州诗人群”和北岛他们，与艾青之间都是有私人交往的。

唐：其他的诗人，例如食指作为先锋诗的先驱者，与何其芳、贺敬之都有传承关系。但是，北岛、杨炼、顾城这些诗人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他们更多地从西方诗歌传统中汲取营养。早期的顾城、北岛之于洛尔迦，芒克之于莱蒙托夫，都是可以辨认的。多多、杨炼在一段时间内则更多受到普拉斯、狄兰·托马斯、桑戈尔等诗人的影响。80年代初文化关禁打开以后，许多外国诗人被介绍进来。新诗每一次大的繁荣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译介，其背景则是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多元文化的交汇。杨炼试图在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一脉相通和彼此辩证的意义上重返古老的文化源头，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曾说他的诗是新的“汉大赋”，主要指《敦煌》、《半坡》这样的诗，包括《诺日朗》。据我所知，杨炼并没有有意识地这样写。他和江河的早期写作都曾受惠特曼、聂鲁达等“革命民主主义”诗人的影响，追求气势、排场，基本属于宏大抒情的风格。

张：这可能跟当时写作环境的限度有关系。早期这些人与外国某个诗人作品的“相遇”，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因为那时只能提供这样一些有限的外来资源。更多的、更新的外来资源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译介的。这几乎决定了早期朦胧诗人和他们作品的思想性质，它们恰恰是和你所说的“革命民主主义诗歌”潮流、浪漫主义诗歌思潮更为接近的。而随着现代派诗歌在80年代之后的集中译介，后来更年轻的一代诗人就受“现代派”的影响更多了。

唐:很少有人谈到这批诗人和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也许普遍认为没什么关系吧。但宇文所安似乎慧眼独具。在《何谓世界诗歌》一文中他认为北岛诗歌的意象和风格很容易使人想起中国古典诗歌里透明的灯笼。作为一个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他通过北岛的作品发现了新一代诗人与传统的呼应和传承关系,尽管不是以一种直接的、脉络清晰的、可描述的方式,所谓精神血缘……

张:我想也许没有汉学家说的那么复杂。北岛创造了一种与“红色编码系统”不同的另外一种编码,带有“秘密”性质的,例如,黑夜、礁石、星星、海洋……这些冷色调的词语组合,组成了一个另类的表意符号系统。实际上,舒婷、顾城他们与北岛使用的是同一个符号系统。还有更早的“贵州诗人群”,例如哑默的《海鸥》,还有你编的《在黎明的铜镜中》所选的他的诗。哑默等人的表达方式与北岛、舒婷、顾城也是同一个符号系统。简单地说,他们使用了一套与“红色编码系统”相区别的编码系统,形成秘密的话语空间,使它传达的审美思想、信息具有异类性和叛逆性。这也许和中国古代诗歌中比较讲究“意象”、“意境”、“含蓄”的传统有不谋而合之处吧,我倒不认为他们的诗歌中有多少真正的古典传统,如果有,应该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

唐:欧文的说法也许过于皮相了。但我的意思是,传统是可以不断被再生的。所谓再生首先是指精神实质和内在元素的再生,在此过程中必定会融入一系列新的异质因素。至于风格,包括书写方式等等,那是第二义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北岛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代表人物,成为朦胧诗以及后来的先锋诗最具象征性的人物,一方面得益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尤其是意识形态对抗,另一方面得益于汉学家的翻译。然而,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呢?况且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一定有更加深刻的,包括诗本身的道理。

张:这个问题我理解可能比较浅,可能是因为他的“话语方式”,正好介于当时社会各种话语对接交汇的某个点上。比如,顾城可能过于个人化了,语言太弱;江河又过于社会历史化,太硬。恰恰是北岛的诗

歌里，社会话语的含量、先锋话语的含量以及区别于红色话语的、具有陌生化效果的秘密话语的含量，还有公共理解能力所能达到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刚好在一个“合适的结合点”上。倒并不是说北岛的诗歌成就有多么高。我比较相信你编的《在黎明的铜镜中》，这本书重新编排了先锋诗的谱系，可以说“先锋诗歌谱系学”的建立是从这本书开始的。它改变了80年代初，由辽宁几个大学生利用有限的资料和视野范围编选的《朦胧诗选》所形成的成见。《朦胧诗选》虽然也是朦胧诗最初经典化时期出现的标志性读本，但它遗漏了最重要的“前朦胧诗”先驱们，局限性是先天的；而《在黎明的铜镜中》则开始从朦胧诗源头上梳理先锋写作的谱系，特别是黄翔和哑默所代表的“贵州诗人群”、“白洋淀诗群”，还有食指等一些早期北京“地下沙龙”的诗人的作品，都收进来了。从入选的诗歌文本看——如果你也相信你选择的这些文本的出处和确切年代的话——根子是其中表现出最夺目才华的一个，还有更早的黄翔、食指。论思想也许黄翔更到位；论艺术则也许根子最现代。他1971年前后写的《致生活》、《三月与末日》等，至今我看也未有出其右者。

唐：是的，是最灿烂的一个。

张：他的《三月与末日》那首诗，在我看来，不论是从技术还是从思想的复杂性、高度上来看，完全可以“覆盖”所有的朦胧诗写作，任何一首朦胧诗都不能与它相比。

唐：覆盖未必，但肯定独一无二、领袖群伦。多多说过，当他最初读到这首诗时完全被惊呆了。以前他认为最好的新诗是艾青的诗，现在突然冒出了《三月与末日》，完全在他的阅读期待和既定尺度之外，他无法评判，只好判定这不是诗。多多的品味是足够苛刻的，但根子的诗还是给他造成了如此的冲击。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同样有点“蒙”：有人那么早就写出了如此纯粹而又如此强有力的作品，太不可思议了。我一直认为根子是最早的“个人写作”的典范，在那批诗人中是最有天才的；遗憾的是他作品太少，因为他其后不久就放弃了写作。据芒克

说,他之所以罢笔,是因为和他一起听《天鹅湖》唱片,遭人举报,被派出所办了“学习班”的缘故。就这么简单。天才大多是脆弱的,更有天才的就更脆弱。

张:后来我又看到过他的《致生活》,完全可以与《三月与末日》媲美,只是风格是诙谐的,它有效地补充了我们对根子的理解。根子的诗歌经验不但是先锋的,而且是复杂的、丰富的、日常的。在革命的年代,他的思想实际已经到了“后革命时代”,因此才能写出《致生活》这样诙谐反讽、幻灭感极强的诗歌。

唐:《三月与末日》也可以这么看。

张:可以说,他与以现代主义和启蒙主义精神为主导的先锋写作“主流”并不一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原来我们把“朦胧诗”看做是先锋诗歌经典文本的核心和起点,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历史追溯,是否应该重新调正这个历史概念?由于这批更早的诗人的出现,先锋写作的历史概念是否需要重新梳理和定位?

唐:当然可以也应该不断地重新梳理和定位。这里实际上涉及诗歌发生、传播、影响和评价的复杂性,说得大一点,关涉到如何看待、如何呈现诗歌史的方法问题。重要的或许是:放弃那种从一个只能是虚构的“原点”或核心生发开去的一元的、线性的、本质主义的眼光和思路,而尝试一种多元的、交叉复合的,从根本上反“历时性”的眼光和思路,以把人为设定形成的成见及其影响减至尽可能小。这是个大问题,此处只能原则性地说到。当代先锋诗的谱系如同艾略特所说的“秩序”一样,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其契机是创新,但也包括人们的重新认识,而重新认识往往根源于前在的写作作为范型对后起者所产生的影响、启示,甚至激起的反抗。从这个角度看,根子的问题在于出现得太早,其文本在传播方面受到了各种限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远没有像北岛、芒克那么大;而食指对新一代诗人在写法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和人格上的。食指的写法是比较保守的,基本上是半格律的一路,从闻一多到贺敬之、何

其芳所采用的那种诗歌形式。大家更多是把他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先驱者来认同的。当然,这是说到眼下为止的情况,至于将来,谁也说不好。

张:一个先驱者活到了“今天”……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食指和时代的关系是他成为一个重要诗人的基础,就是你所说的“个人性写作”。在合唱的年代,他采用了个人抒情,个人化的写作。并且,以这种写作姿态与时代保持一种分离和紧张的关系。这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精神异类、一个英雄和先驱形象的基础。关于“贵州诗人群”,如果单提黄翔和哑默,可能会忽略掉他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用“贵州诗人群”的提法,就会涵盖一批诗人。但是,这批人的文本可验证的太少了,除了黄翔和哑默,其他人的文本可验证的太少。这会使我们“建立新谱系”的想法受到限制。

唐: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曾经存在三个“隐性诗人群”:北京、贵州和上海。当时像是三个各自漂浮的诗歌孤岛,现在则可进行同质的分析比较。三者中,“北京诗人群”迄今引起的关注最多,资料收集和相关的研究也最充分;“贵州诗人群”要差得多,但不管怎么说,已经有人做了相当数量的文本收集并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工作;唯有“上海诗人群”,各方面几乎可以说还是空白。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系于对当代诗歌的影响力。上海那批诗人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贵州诗人群”的影响主要体现于黄翔,但和后来被归入“今天派”的“北京诗人群”相比,就要弱得多。80年代的总体氛围是启蒙主义精神的高扬,诗歌领域内的大事则是个体主体性和诗歌本体意识的自觉。“今天”之所以影响卓著,固然和那场持续两年的朦胧诗论争有关,但也离不开他们的作品和有关的诗歌主张。比如,北岛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诗歌形式的危机问题,应该是当代从诗歌本体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他的作品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相应的尝试。再比如江河、杨炼的“史诗”实验,不仅尖锐突出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同时也提出了本土寻根和创作资源多元化的问题,实际上开了寻根文学的先河。